

# 古籍辑佚学在数码时代的发展机缘

——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序

陈尚君

**摘要：**本文是为史广超博士新著《〈永乐大典〉辑佚述稿》所作序，主要介绍该选题的考虑过程、写作追求和创新见解，并藉此评述前代古籍辑佚的成就得失，认为古籍数码化为现代学者从事古籍辑佚提供了新的难得的机遇，我们可以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遵循现代学术的规范，取得超过前代的成就。

**关键词：**古籍辑佚学；古籍数码化；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书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6-0056-03

广超将博士论文增订完成，交付出版，问序于我，我忝为导师，当然有为学生揄扬的责任。但我也有一些担心，即老师表扬学生，大致也如学生彰怀老师一样，总会带有太多的感性成分，评价很难公允。我因此而就商于广超，我在序中只介绍选题的考虑过程、论文的写作追求和完成文稿的创新见解，评价则尽量从简。同时，我很想利用作序的机会，谈谈前代古籍辑佚的成就得失，以及古籍辑佚学在数码时代的发展机缘。

2003年春，广超以河南大学文献专业应届硕士生的身份，报考我的博士生。录取过程有些波折，所幸最终顺利入学。他在硕士期间做唐诗文献研究，论文好像是做姚合文集版本的研究，从完成情况看，专业基础还扎实，写作能力亦可。但我一直认为，从硕士到博士，除了学习时间的延长和论文长度的增加，最重要的是要选择在上学术上有较大突破空间，并能在毕业后可以长期持续进行研究的课题。唐诗文献前此做的人很多，唐集版本研究是文献基础训练的课题，但就选题意义来说，则稍嫌局促了一些。我希望他跳出原来的局限，在更广大的学术空间中发掘课题，我也提供了一些选题供他遴选。经反复论证，最初的设想是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专门做四库馆的辑佚书研究，二是以《永乐大典》辑佚为主线，重点还在四库开馆期间的辑佚诸书。在最初的犹豫和检查资料期间，由于了解到台湾学者顾力仁先生已经出版《〈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95年6月），广超在阅读顾书后，决定有意识地与顾书有所区别，

重点探讨四库馆辑佚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和成就。

在此拟稍微介绍半个世纪以来《永乐大典》影印出版和研究的情况。《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嘉靖以后仅存副本，四库开馆时已佚一千多册，仅存20473卷。（《办理四库全书档案》收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军机大臣奏折）近代以来毁于兵燹。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从世界各地搜集所得，仅存730卷。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据以影印时，增收西德和台湾所存的741卷。1982年中华书局续印新得67卷，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印行海外新得17卷，使存世文本增加到813卷。虽然仅有原书的百分之四弱，但保存的研究线索则极其丰富。据以展开的研究工作，如苏振申作《元经世大典》的研究，栾贵明、孔凡礼做宋人诗文辑佚，马蓉等做方志辑佚，皆有可观。前引顾著则是有关《永乐大典》辑佚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大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硕士论文基础上增订而成，全书包括：绪论、《永乐大典》之纂修、《永乐大典》之体制及其内容、《永乐大典》之录副及其沿革、辑佚学之定义及其在学术上之价值、《永乐大典》之辑佚及其批评、《永乐大典》辑本对学术之贡献、《永乐大典》存本待辑书目等各章，并附详尽的《〈永乐大典〉研究之资料与论文索引并提要》。可知顾著前半是有关《永乐大典》纂修和沿传的研究，后半则谈辑佚，其中关于《永乐大典》辑佚活动的研究仅有一节，且横跨从清初到近代的各个时期，重点还是谈辑本的价值及依据《大典》索引排比今后可以辑佚的书目。顾著当然有重要的意义，有关《大典》辑佚的宏观考察以及指示今后可以辑佚的方向，都可给学者以启发。但我与广超分析后，觉得就清人利用《永乐大典》所做辑佚工作的具体研究来说，顾书还留下很大的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根据现在已经发表的《大

收稿日期：2009-8-6

作者简介：陈尚君（1952-），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隋唐五代文学与文献。

典》文本和有关资料，如果再能充分发掘各大图书馆保存的文献，仍有很大的开拓领域。

广超在以下几方面的探讨，尽了很大的努力。一是普查《大典》辑佚书目。虽然前人在此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积累，但辗转引述的情况颇多。广超坚持逐书翻检，探索第一手的文献，因而可以确定一些前人认可的书并非辑本，而于全祖望的辑佚活动则有更多新的发现。在此基础形成《大典》辑佚书相对全面的书目，可以为学者所信任。二是探讨各时期诸家《大典》辑佚活动的过程、方法和所得成就，侧重在四库开馆前、四库编修期间和《全唐文》馆的辑佚活动，其中有许多重要的发明。比如，四库馆臣辑佚分工以及各家所得的情况，以往学者仅了解一些最有名学者的辑本和大体的分工，广超则通过详密的文献调查，确认参与辑佚工作的41位馆臣的生平和分担辑佚的具体书目，凡考出140多部著作的实际承担人，虽然大约仅占全部辑佚书的四分之一，已经是很大的创获。关于《全唐文》馆的辑佚活动，十几年前我研究《全唐文》成书过程时，也曾有所注意，只是没有做专门探讨。广超的工作以徐松的辑佚书活动为考察重点，关于《中兴礼书》辑佚的评价，用力至勤，发明尤多，我感觉是继陈智超先生《解开〈宋会要〉之谜》一书后，关于徐松辑佚书研究的又一力作。关于徐松《登科记考》和《宋两京城坊考》中采录《永乐大典》资料的揭出，对唐文史研究也颇重要。三是在研究过程中，通过爬疏文献所得资料，编成7种附录，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几种前人编《永乐大典书目》的新增订本，关于辑本之存亡和今本残书中的保存情况有所说明；另四种为作者新编的辑本目录，分为四库馆前、四库馆所辑、《全唐文》馆所辑和《全唐文》以后所辑四部分，对各辑本的相关情况在备注中有所交代，这部分工作较前人更为精密而细致。另外一种为《中兴礼书》辑本的补遗。

应该说，广超在这样一个具有高难度的课题上，作出现在的业绩，论文的完成质量超过了我的最初预期。从这里我有两点感受。一是具有学术悟性的学生，适当地给以施加压力，他的学术潜能可以达到充分的发挥。在这篇论文中，我感觉到广超已经具备成为一位优秀学者的才能，只要他能持之以恒，并能得到适当的学术条件，可以作出更突出的成就。二是古籍辑佚学虽然前人做过大量工作，只要认真发掘，仔细清理，充分利用现有的学术资源，还有许多值得开拓的重大学术空间。

所谓古籍辑佚，是部分或全部恢复已经亡佚古籍的一项工作。辑佚起于何时，曹书杰教授《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有详尽的考述，较多的意见是形成于宋代，但在宋以前已经有各类恢复古本的努力。曹著认为宋以前辑佚的方法还不完善，辑本规范是南宋以后建立的，结论比较圆通。到清代，辑佚成为朴学考据的一个重要方面，成绩也空前丰富。梁

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专列《辑佚书》一节加以论列，虽然他认为辑佚书“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也充分肯定清儒各家辑佚的成就，并提出判断辑佚书优劣的四条标准，即注明出处，并尽量举其最先者；辑佚求备，多者为优；既需求备，又须求真，不要贪多误收；尽量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都是很好的见解，值得从事辑佚的学者遵从。

但从今日的学术立场来看，历代学者的辑佚书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宋人的工作，还处在辑佚书的初创阶段，当然不能计较。如果严格地说，如北宋前期史馆补录北朝诸史，发现缺卷，如《北齐书》仅存三分之一，就用别的史料将缺卷填出来。当时人不以为非，后人是难以想象的。明代人的办法要诡譎一些，他们从常见书中钞录遗文，简单编录后就作为原书刊布，更不作文献来源的说明。如唐代的《朝野僉载》、《明皇杂录》都属于此类，今人也加重视，因为其毕竟是明代的文本，但如深加追求，则问题很多。最近李剑国教授的《新辑搜神记》就是对明代杂拼式辑佚书的一次彻底清算。

从大的方面来说，当然以《永乐大典》辑佚书的收获最重要，清人辑自该书的六百多种书，不仅包括许多规模很大的著作，许多佚著的存留文字也极其丰富，这是由《永乐大典》经常将整部书整体辑入的特殊体例造成的。其他依据存世文献的辑佚书，就没有这么幸运。虽然从《古逸书辑本目录》所提供的唐前古逸书的辑本超过千种（集部的诗文辑录未计入），多数著作的佚文并不太多，有些仅寥寥数句，距离原书面貌还很远。就清人辑本的覆盖范围来说，大约以经部诸书最充分，其次为小学和诸子，再次为各种杂史，其他方面则欠缺甚多。最近见到影印的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可以知道他最初在《玉函山房辑佚书》基础上记录古小说，但该书所录仅9种，鲁迅所得较具规模的近三十种六朝小说，马氏都没有关注。再次，清人的引述文献，一是版本未必尽善，二是引书未能完整交待来源和卷次，三是辑录文献未能穷尽，象王仁俊那样随得随录，无论多少皆算一种，当然为最下。

面对前人的辑佚遗产，现代学者该如何应对呢？充分尊重，全面校勘，当然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做法，但结果则常很难令人得到阅读愉悦。比如中华书局多年前出版今人整理的《明皇杂录》，以明辑为底本，将清代以来的辑佚逐次展示，三四万字的内容分为五段，规范是遵守了，但对读者来说，实在是一次失败的杂烩。就整理体例来说，我特别赞赏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两位前辈整理的《纬书集成》。对每一种古纬书，尽量追溯最好的文本和最早的记录，逐条说明佚文来源和卷第，说明不同书引录的文本差异。同时，在佚文的下方，逐条说明明末至清代各家辑录古纬书时的存否的记录。

这样的整理，不淹没前人辑佚的成就，又体现一切追溯最可考文献的现代学术理念，无疑是值得我们参酌的。

近年古籍数码化工作的普及推广，引起一些学者对于传统学术当代命运的重新思考，一些极端的说法，认为古籍辑佚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所见有些道理。以往的古籍辑佚学家，一般都是在广览群书时记录佚文，逐渐集腋成裘，得以成编。古籍全文检索实现后，上万种古籍中引到哪些典籍，似乎只要将书名输入，瞬间即可得到大量线索，无劳日积月累的辛苦，更不用皓首穷经地苦读，一切都变得如此轻快惬意。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古籍数码化提供了古籍全面检索的极大便利，无疑可以带来文史研究的革命性变化，一些倚靠文本积累的基本文献工作，得益尤大。比如汉语词汇研究，以往的学者都有许多装卡片的小抽斗，记录多少年来读书中搜集到的语例，但现在利用电脑，一搜就可以得到成百上千的语例。再如研究古代语法，那种句型何时出现，也较难明确判断，现在一些具有高级搜索功能的语料库也可以给予解决。古籍数码化的实现，为学者省

去了许多劳累，也要求学者不应仅满足基本语例的积累，而应该在新的角度探究学术课题。就古籍辑佚学来说，情况也一样。

我觉得，要达到梁启超所述古籍辑本优秀的标准，学者大约要经历文献收集、校订、鉴别、编次四道工序。古籍数码化提供了第一步文献收集的方便，但仅此一步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检索完成。因为同一书的佚文，在各书中称引时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名称，甚至不提书名而可以判断出自某书，这些都需要学者以敏锐的感觉来加以判断。至于校订、鉴别、编次，更需要学者以很大的耐心来做出处理。因此，我认为古籍数码化为现代学者从事古籍辑佚提供了新的难得的机遇，我们可以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遵循现代学术的规范，开创超过前代的成就。就我近年所见古籍辑佚书的成就来说，如尚志钧辑录唐宋本草书那样，利用现存文献，能将一系列已经失传的古本草书大体恢复原编，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值得对各个学科古籍有兴趣辑录的学者参考。

以上所谈，不知广超赞同否。

### The Development Chance of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in Digitalization Time----the Preface of Shi Guangchao's *Yongle Dadian Jiyi Shugao*

CHEN Shang-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Fudan University 200433)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preface of *Yongle Dadian Jiyi Shugao* (永乐大典辑佚述稿) by Dr. Shi Guangchao. It mainly deals with the points of Shi's book, its goal and finds. Then, this article retrospects achievements and lessons we have gained in the field of collection. It also claims that the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provides new chances and enables us to move further in this field while sticking to today's academic criteria.

**Key words:** collection of ancient books;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Shi Guangchao; collection of *Yongle Dadian* (责任编辑: 石磊)

---

(上接第 80 页)

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这是说，董仲舒曾讲过，淫雨不止，就祭女娲。这是《春秋》里没有的话。伏羲、女娲都是圣者，为什么单要祭女娲呢？对此，王充回答说：虽然两者都是圣者，但伏羲是男，主阳，女娲是女，主阴。雨不停止，是阴气作怪，所以祭女娲求她福佑。从这则史料看，一是汉代图画女娲之像在汉代民间的存在极为普遍。以今天可见的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证之，再联系王充所谓“男阳而女阴”的解释，两神当是并图，已明其为夫妇关系。二是文献中伏羲、女娲两神常常并提的情况，在董仲舒的西汉时期就已出现，其原因在于汉人是从阴阳交感、化生万物这一观念出发，去看待这两位古老传说中的始祖。这反映出上古神话在汉代不仅表现出神话——历史化的趋势，也表现出神话——观念化的特征。像这一类的改造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

### Rescan the Relation between Fu Xi and Nu Wa

CHEN Xiang-ch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two deities Fu Xi and Nu Wa in Chinese mythology were considered as a couple at the first. The independent relation between them had been transformed in many centuries. In Han dynasty people interpreted the two deities with political and theological science, Yin-Yang and Wu-Xing were used to explain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world was created by Fu Xi and Nu Wa whom were had been expounded to be a couple.

**Key words:** Fu Xi; Nu Wa; Philosophy Trend in Han dynasty; Yin-Yang

(责任编辑: 陈剑)